



變局與突破

近代俄國思想與政治

段昌國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變局與突破 / 段昌國作. -- 臺北市：歷史智庫，民98.05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ISBN 978-986-83639-2-2 (平裝). — ISBN 978-986-83639-3-9 (精裝)

1. 俄國史 2. 近代史 3. 政治思想 4. 政治發展

570.948

98007331

變局與突破

近代俄國思想與政治

段昌國◎著

發行人：王必成

社長：東年

主編：李惠華

編輯：蔡佳岐

出版：歷史智庫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100)延平南路70號一樓

電話：(02) 2361-7321 傳真：(02) 2361-7260

郵撥：18789062 電子信箱：history@udngroup.com

設計・印刷：飛鴻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南縣仁德鄉太子五街22巷6號

電話：(06) 2726988 傳真：(06) 2724006

總經銷：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四維巷2弄2號4樓

電話：(02) 2219-2080 傳真：(02) 2219-2180

初版：2009年5月

定價：平裝320元 精裝420元

歷史智庫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平裝)：978-986-83639-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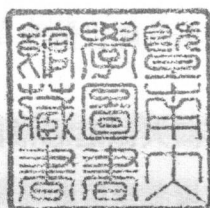
ISBN (精裝)：978-986-83639-3-9

D095.124
2014

港台書

變局與突破

近代俄國思想與政治



變局與突破 —— 近代俄國思想與政治

目錄

上篇：保守V.S進取 —— 俄國思想與政治變動	6
前言：近代俄國變動的本質	7
第一章：俄國改革運動中的保守思想	28
一、俄國保守思想的特質	30
二、保守派的處世情懷	47
第二章：舊政權危機與激進思潮的興起	61
一、舊政權危機重重	63
二、激進思潮洶湧而起	87
第三章：兩種形式的改革 —— 微德式與史托里賓式及俄國的轉向	99
一、民粹主義與工業化衝突	101
二、微德與史托里賓的改革藍圖	122

下篇：困局V.S突破 —— 社會變動與沙皇政權	140
第四章：十九世紀後期俄國仕紳階級的危機與反抗	141
一、貴族仕紳階級的分解	143
二、社會分解下貴族仕紳的轉變	149
三、仕紳階級的反抗	156
第五章：絕望的改革：十九世紀後期沙皇政權的困境	166
一、在浪漫主義情懷下的改革	167
二、官僚化的保守改革	173
三、沙皇的王權改革	177
四、改革的絕望本質	183
第六章：社會分解下的沙皇王權與政治參與	193
一、私人利益團體的政治參與	194
二、組織化利益團體的政治參與	200
三、沙皇王權與政治利益	205
四、社會分解下的利益趨向	213
結語	227
徵引書目	237
Index	271

自序

「Who are you？」這是在普林斯頓大學狄更生樓近代俄國史專題討論的教室中，布萊克教授（Prof. Black）對我說的第一句話，似詢問又似好奇，但他親切和祥的態度，讓我意外，又不覺拘束，接著他問我，願不願意隨他去研究室談談，我毫不猶疑說好，就此開始了近十年的師生之誼。

事實上，那天我聽了兩位主持教授（另一位是Prof. Wortman）與十餘位同學三小時的討論，如雷灌頂，但卻像鴨子聽雷。那年，我隨翔飛與小女姍姍一同去普大，我有半年的休學時間，無所事事，隨意翻了翻歷史系的課程表，我只認得布萊克教授，便想與其在圖書館一個人閒看書，不如聽聽他的課。他們已進行到第二週，因此我完全不知課程架構，有共同閱讀的三本書，又各自選一本討論，難怪我像鴨子一樣，看到同學與Prof. Wortman熱烈討論，Prof. Black則安詳的坐在主席位旁，比較少說話。他後來在研究室向我說明課程的綱要，問我的情形後，便約我下週上課前一小時去看他。

我感到驚訝的是，他在第一次見面後幾天中，打了電話給芝加哥大學我的前指導教授與普大EAS（東亞系）的Prof. Mote。再見面時，他對我說：「Tuan，我知道你的狀況了，基

於他們兩位的推薦，我想你最好是進普大，或附近的學校，你覺得如何？」我回說：「真是謝謝，當然普大好，不過歷史系很難進去吧？」他說，他從來也沒辦過這種事，不過他會問問系裡同仁。後來Prof. Mote告訴我，歷史系雖同意接受，卻沒獎學金，但Prof. Black非常堅持，終讓我擠進名單，不過要每年考核。那年春天我就轉進普大歷史系，與翔飛三度同學。

Prof. Black是研究俄國史與比較現代化的傑出學者。他的現代化動力一書，馳名國際，被譯成二十餘國文字流傳。我在他指導下，逐步進入俄國史的研究領域，1983年我得到學位返國，攜回數十箱的書籍，最值得珍藏的是他親筆送我的四本書，尤其有一本是坊間已不再印，但卻是課上必讀參考書，他聽我說了後，竟然將他保留的第二本送給我，這位老先生真令人懷念與尊敬。1989年我在威斯康辛大學參與座談時，那邊歷史系一位教授告訴我，他在紐約時報上看到Prof. Black的訃聞，他的心臟病終於未饒過他。我當場心情波動，輪到我講時，我先說了一段回憶感念的話，有人告訴我，與會者很多都受感動。因為這真是一段奇妙的緣分。我從他那學了很多作學作事的方法（他擔任國際研究中心主任20年，直到退休）其實虧欠的更多，現在年過花甲，出一本小書，除了深深的懷念，也聊表一些心意。

序文

1990年夏，翔飛病逝香江，是我人生最悲痛的事，回想與她在普大校園一同讀書的一千餘個日子，以及後來幾年她重返普大，有三年的寒暑假，我飛來與她及姍姍相聚，沒有她的因緣，我也不會來普大，把這本小書獻給翔飛，除了代表一分謝意外，更有著永遠的懷念。

關於這本書的出版，我要感謝很多人的協助，謝謝熊宗慧教授俄文方面的指導，她是台灣後起傑出的俄國文學研究者，謝謝朱英嘉、王家慧兩位小姐細心的排打，謝謝歷史月刊東年社長，當此不景氣之時仍願慷慨出書，更要謝謝內人柯倩華女士，她審閱全書一遍，改正了很多疏漏之處。最後要謝謝飛鴻文化公司的范國平董事長、范剛覺先生與蔡佳岐小姐相助，他們精心設計，讓這本書有出奇的面貌問世。再次謝謝各位，其他若有什麼錯誤，概由作者負責。

段昌國

序於枕山小築

2009.4月



俄國古地圖，左上角是1614年時的莫斯科地圖

前言

近代俄國轉變的本質

十九世紀的俄國是個紛紜擾攘，錯綜複雜的時代。無論是從思想、政治、社會、經濟任何方面來看，都呈現出「漁陽鼙鼓動地來」、變革頻仍的現象。這種現象以現代社會的角度來看，並不特殊，也非獨一無二。但俄國變動中，卻隱含了相

當意義的突破，這種突破，不僅具有思想層次的意義與影響，同時包含了政治形式與結構的功能變動，但不論是保守式的突破，或是激進式的突破，都企圖努力從困境中掙扎出來。但諷刺的是，保守式的突破固未能挽救統治三百餘年的羅曼諾夫王朝，激進式的突破，也無法證明列寧宣稱的共產政權是命定結局，最終還是只撐住了八十年便告崩解。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從困境中力求突破，不論是走向保守或激進的趨勢，對現在社會都有值得一探究竟的價值。

事實上，帝俄社會兩世紀以來早已經歷無數的變遷，接連不斷的改革、革命、暗殺、領土紛爭以及社會衝突，都反映出俄國社會結構與領導份子的思想行為模式不斷地適應停整。但在同時，俄國社會也正進行一個更基本的轉變，這個轉變主要由西歐及中歐社會模式所刺激產生的。這些社會無疑是站在革命性轉變過程的前端，由智識革命為泉源，政治變動為先期影響，而配合史無前例的經濟成長與社會變遷。這種革命性過程所達到各種層面的成就，或則可以通稱現代化，是西歐社會變動的原始模式，也是其他所有後來的社會，包括俄國在內，企圖追求的理想目標。

俄國政治領導者面臨這個劇烈變動的最初反應是採取，至少是適應那些適合於維護傳統社會，免於鄰國日增威脅的現代

制度。這種發展的動機是防衛性的，它所採取的制度本質上對社會結構與政治的內涵並沒有根本的改變。就這個意義來說，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充分說明了這種現象。他的改革固然將中央政府的行政與軍事合理化，同時加強了政府對貴族地主與城鎮市民及地主對農民的控制，但他從未曾計畫將西歐現代化先進國家的社會與經濟制度嘗試來適應俄國社會。¹這樣，傳統的社會結構固然成功的維護下來，但相對的說，俄國社會的靜態平衡與西歐的活力變動日益形成差距，²仍不斷迫使俄國領導份子關懷備至，在十九世紀上半葉，亞歷山大一世與尼古拉一世

-
- 1 關於彼得大帝的研究，非常豐富，但以現代化的眼光來評論的，以 Cyril E. Black, "The Reforms of Peter the Great" 為代表，此文收錄在 C. E. Black 編，*Rewriting Russian History* (New York, 1962), 232-259。另外，Mark Raeff, *Peter the Great, Reformer or Revolutionary?* (Boston, 1963) 也蒐集了不同論點的討論。俄國史家論述更多，著名的如 S. M. Soloviev (1820-1879), V. O. Kliuchevsky (1841-1911) 為代表，尤其是後者開創了俄國經濟史的研究。他的學生 Pavel N. Miliukov (1859-1943)，更對彼得改革與十八世紀俄國經濟的發展有深入的分析，參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ой четверти XVIII столетия и реформа Петра Великого* (十八世紀前二十五年俄羅斯國家經濟與彼得大帝的改革)，2d ed. (St. Petersburg, 1905)。但第一次出版則在 1892 年發行。至於最新的研究，以 Nicholas V. Riasanovsky, *The Image of Peter the Great in Russian History and Thought* (Oxford, 1985) 為代表。
- 2 Henry L. Roberts, "Russia and the West : A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以及其他相關討論，*Slavic Review*, V. 23, No. 1, March, 1964, 1-30.

任內，曾認真考慮許多改革計畫，有些且已付諸實施。但是這些少數的改革方案，在沙皇完全控制立法創制權，很少與民眾意見聯繫的氛圍下，正如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所說：無論統治者或被統治者都是依據他們的行為法則，往往並不瞭解改革的實際意義為何。³而我們更可以進一步瞭解，在克里米亞戰爭（1854-56年）前的俄國，事實上瀰漫著一種虛誇的意識，否定任何制度的安排是國家福利的可能資源。⁴因此改革的意義並不在於能否擔負功能發揮的角色，而在於他們是否有能力給傳統俄國的三大柱石：「專制政體，東正教和民族國家」賦予更深層的具體內容。

然而，另一方面，懷抱著改革心態的知識分子，以俄國兩京一聖彼得堡與莫斯科為中心，不斷散發政治危機與期待改革的論調，下面引用一位當時著名的史學家在回憶錄中說：「我們相信，唯有災難及慘烈的戰爭才會帶來有意義的全面改造，停止繼續的腐敗」。⁵這種帶有悲觀意味的觀點，在十九世紀初

3 Alexis de Tocqueville, *Oeuvres complètes*, 9vols, Paris, 1864-66, IX, 123.

4 參見 Nicholas V. Riasanovsky, *Nicholas I and Official Nationality in Russia, 1825-1855* (Berkeley, 1959), 第三、四章。同時，也可參看 Nikolai Barsukov, *Жизнь и труды М.П.Погодина* (波格金的一生與著作), 22vols; (St. Petersburg, 1888-1906), 特別是 V. XVII與 V.XVIII.

俄國外交軍事節節勝利時，或許得不到人民廣泛的共鳴，但是可反映出知識份子在積弊重重下要求改革的心理。這種心理意識在變亂叢生時，便容易傾向過激的言論，正如1856年一位匿名的作者宣告：「激烈主義的時代在俄國來臨了，就像它在西歐的情形一樣」。⁶不過，事實上，並不完全一樣。這個時期的俄國激烈改革派尚未興起革命推翻的主張，甚至要組成反對黨都相當猶疑。我們看1857年奧加瑞夫（N.P.Ogarev）在流亡法國的北極星期刊（Poliarnaia Zvezda）上寫到：「我們並不是要號召成為一個憤怒的反對派來面對新政府」（指亞歷山大二世），而是要提供堅定明白的批評，讓政府可以公開而坦承的察知錯誤」。⁷

這在政治上還是很溫和的作法，但所散發的反政府情緒仍使得保守派震驚，他們轉求內在的省察以挽救政府的權威。薩馬林（Iurii Samarin）便是一個代表，他是著名的神學辯論

5 是 S. M. Soloviev 的話，引自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классовом освещении（階級意義闡述下的俄羅斯歷史文學），M. I. Pokrovskii, ed; 2vols (Moscow, 1927), 1, 267.

6 B. N. Chicherin, Записки прошлого（過往的手記），S. N. Bakhrushin 與 M. A. Tsiavlovskii eds. (Moscow, 1929), 162.

7 N. P. Ogarev, Избранные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社會政治作品選集）（Leningrad, 1857），I, 117.

家，即號召跟隨者「轉向我們自己，研究國家衰落的基本原因，想出一個治療的方法」。⁸從上面粗疏的敘述，可以約略瞭解到十九世紀中葉前，俄國改革運動中隱然有個分野，傾向保守思想的以防衛舊體制傳統為主，傾向激進思想的以批評時政並且突出個人主義為主。這種爭議在克里米亞戰爭前尚不明顯，但想訴求群眾公意的心裡則是相同的，因此宣傳小冊的作者、雜文家及室內演說家無不公開討論各種觀點看法。對應之下，報章雜誌涵蓋了各類不同的意見都被寬容的新聞檢察官接受。據俄國學者李索夫斯基（N.V.Lisovskii）的統計，在尼古拉一世時代（1825-55），每年創辦的報章雜誌平均是8.3，然而從1856年到63年期間，每年出刊的雜誌平均達到33.4，⁹可見輿論發皇的現象。

這種充滿意見活力的情形的確使亞力山大二世政府比尼古拉的軍事政權有更多管道接觸輿論的壓力，同時，知識分子也比過去更希望獲得地位來開導政府領袖。這種新形勢的交互影響，在克里米亞戰爭後，終於促使官方意識形態的破產，無

8 Iurii Samarin, Сочинения Ю.Ф. Самарина (薩馬林作品選集) (Moscow, 1877-1911), = 2 * ROMAN II, 18.

9 N. V. Lisovskii,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русской периодической печати, 1703-1900 (俄羅斯定期刊物索引, 1703-1900) (Petrograd, 1915) 67-183.

法再堅持為了國家福祉的需要而維護制度化傳統的觀念。而軍事的挫敗，更使得俄國承認落後不如西方，自然傾向外來的觀念，放棄舊有的原則。一位聖彼得堡的檢察官說：「昨日的思想，今天已是陳舊了」，¹⁰正代表了這種求新的潮流。

從1856年到57年的兩年中，俄國期刊討論西歐國家的文章無論質量都有驚人的增加，¹¹在此同時，把俄國內部事務尤其是爭論的議題與西歐國家比較改正也開始出現，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奧國的經驗為鑑討論解放農奴的問題（奧國於1849年解放農奴）。一般西方史家都認為克里米亞戰敗的刺激，轉變了俄國官方意識形態，贊同改革而以西方為模式，那麼，1861年的解放農奴就成為俄國政治領袖轉向西方觀念與制度，從被動防衛到主動適應態度轉變的分水嶺。當然，1861年只是一個象徵性的年代，如前所述，俄國有些方面的改革早在此以前已經進行，而有些方面直到十九世紀末仍未受影響。但在近代俄國轉變過程中，1861年的解放農奴確實引導了全面性的變動。

10 A. V. Nikitenko, *Дневник А.В.Никитенко*（尼基謙科的日記）（Moscow, 1955），= I * ROMAN I, 64.

11 根據 B. P. Lambin 的統計，1855年俄國期刊所見關於歐洲國家的文章只有97篇，但到1856年即躍增為269篇，1857年則有300篇，其中以法國最多，英奧次之，1857年時，英國躍居首位，參見 B. P. Lambin,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俄羅斯歷史圖書目錄）（St. Petersburg, 1856-62）.

解放農奴的變動層面並不僅限於農村之中。農奴的解放，也不單只是來自農村的壓力。二十世紀初的俄國自由思想家史羅夫（Peter Struve）¹²就已經懷疑亞歷山大二世解放農奴時的一般論調，認為壓力是來自於農村生產系統內部，導致農奴制度的特續性解體，終於因它本身的負荷而崩潰。史羅夫辯說：也許以農奴為基礎的生產量不如自由農的農業系統，但從個人農莊的觀點來看，一旦把同意分配的田地劃給農奴，則在消除了農奴免費服務的有利因素，而代以生產量雖較高，也較昂貴的自由農後，在農奴與自由農之間確切生產量的不同就變成難以估計的了。他更繼續指出：農業的進一步成長建立在鐵路的運輸上，農奴的維持根本無法與鐵路化的功能相比。¹³史羅夫的這些論點，很顯然不僅牽涉到1860年代，更牽涉到一個不確定的論題，即在以後的發展中，農奴與鐵路建造之間是否有

12 Struve 大體上屬於自由主義者，但他思想形態隨著政治歷程的不同曾經起伏不定，1905年革命後，特別是流亡美國時，他的自由思想比較傾向政治秩序的持續穩定。參見 Richard Pipes, *Struve: Liberal on the Left, 1870-1905* (Cambridge, 1970) 及 *Struve: Liberal on the Right, 1905-1944* (London, 1980)。

13 Peter Struve, *Крепост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в XVIII и XIX веках* (農奴經濟，十八和十九世紀俄羅斯經濟史研究) (St. Petersburg, 1913), 102。

絕對的衝突？事實上，沒有鐵路反而保護貧瘠地區的農業可以連結至黑土帶的北邊，所以能造成這種情形，便是在冬天歲收後，可以大量利用免費的農奴，依賴馬車等運送穀物，而延長了市場的交易半徑，通往那些個人農莊。史羅夫的論點充分說明了十九世紀俄國農村的生產力，並未低落到促使農奴制度的解體崩潰。

不過，從較大的歷史背景說，我們自然要考慮到社會經濟的一般狀況。1860年代的俄國飽受內憂外患，無論是社會結構和經濟型態都處於歷史轉型的時期。以社會而言，俄國社會正從絕對君主專制體系蛻變為農民、勞工、知識分子及資本社會階層分化日益明顯的體系；以經濟而言，不只農業和商業處在上升發展的新階段，工業化更是波濤洶湧的潮流，逐漸從農業經濟型態轉變為以工業生產為主的資本主義經濟型態。俄國的知識份子因此有較大的活動空間，可以從事於「改造」，「教民」的努力，因此大體上傾向於激烈思想，政治安定就不是他們的理想目標了。這是後世知識份子所缺乏的有利條件。這個社會經濟的背景與思想轉變的關係牽涉的層面很廣，十九世紀下半葉俄國思想史的爭論大都是環繞這一主題而進行的。

另一方面，政治制度的轉變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俄國正統的官方意識是中央集權與高效率的官僚組織，這是支持君